



新社会学文丛

“气”与抗争政治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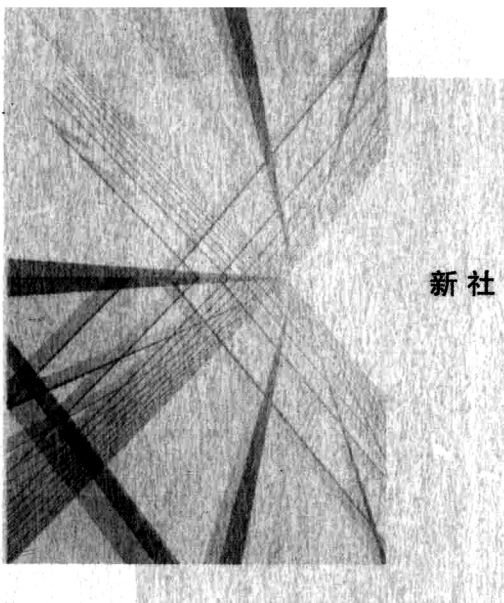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应 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新社会学文丛

“气”与抗争政治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应星/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 应星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新社会学文丛)

ISBN 978 - 7 - 5097 - 2126 - 1

I. ①气… II. ①应… III. ①乡村 - 社会秩序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274 号

· 新社会学文丛 ·

“气”与抗争政治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著 者 / 应 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童根兴

责任校对 / 岳书云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宝蕾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2.8

字 数 / 220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26 - 1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谢

自从博士论文选择当代中国乡村政治这个主题以来，我在上面的研究已经延续了十多年，其间完成的三部著作反映了我从某些特定的角度对最近六十多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思考。由于所选取的角度的敏感性，我从收集材料到研究写作再到出版发行，都困难重重。应该说，直面如此严峻而棘手的问题，是需要勇气的。然而，仅仅具有勇气是不够的。有的时候，这种勇气也可能沦落为伪神的煽动、韦伯所谓“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甚或另一种政治投机。我自己希望能够追随韦伯的学术伦理，努力去展现那些对立场冲突的双方都“不舒服的”事实。但要真正做到“理智的正直诚实”是极其艰难的。这也是我这些研究中内在的困难所在。我期待诸位读者的批评，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同仁在我内外交困的思想旅程中给予的各种帮助。

我要感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伊沙贝尔（Isabelle Thireau）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女士、西班牙 Catalonia 开放大学的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教授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邢幼田教授和刘新教授给我提供的讲学、访学和研讨机会，使我得以在境外查找资料并与中国研究同行进行交流。

我在华北水城市的田野调查，一直是与中国政法大学的汪庆华博士共同进行的。我从与他多年的合作中受益良多。本书第七章的一部分脱胎于我们联名发表的一篇论文。我在西南天仙县的田野调查，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周雁女士的帮助，同时，我也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健民教授与陶林博士，在同往该地调查中他们与我进行了很多讨论。

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孙立平教授以他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厚的现实感和广阔的视野对我的影响。显而易见，本书在许多问题

上的见识都直接受惠于孙老师，特别是他最近牵头成立，我也忝列其中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本书在维稳问题上的许多认识直接吸纳了该课题组已发表的一项成果。我在与孙老师、沈原教授、郭于华教授、晋军博士、毕向阳博士和周飞舟博士的频繁讨论中受益甚深。我还要格外感谢亦师亦友的沈原教授在研究和工作上给我提供的各种无私的帮助。

我深深地感谢我在台湾的老师叶启政教授。叶老师是我一生为人、为学与为师的典范。他的人格境界以及他多年来对我的各种关怀都让我感动，他对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独特洞察更直接影响了本书对“气”这个概念的采纳。

我也要感谢赵鼎新教授、李静君教授、李连江教授、范愉教授、单光鼐研究员、杨念群教授、于建嵘教授、罗琳副编审等人与我在各种场合的讨论中对我的启发。

在时下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我非常庆幸自己十多年来能够一直置身于一个真正以学术为业的共同体里，这个共同体不仅提升我的学养，而且滋养我的人格。尤其是在与渠敬东、周飞舟、李猛、毛亮、吴飞、吴增定、舒炜等人的交往中我学到了很多東西。

我也要感谢在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上我的研究生们与我的共同讨论。我时常能深切地体会到教学相长的乐趣。特别是本书第九章的一部分内容就从2007级硕士生吴长青的硕士论文那里受到了很多启发。

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何南宁。她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实际上还作为我的学术助手，为我完成本书做了不少技术性的工作。

本书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教育部资助项目“弱势群体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研究”的最终成果。本书同时也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和香港乐施会的支持。

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在《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洪范评论》、《领导者》、《政法论坛》、《开放时代》上发表。在此对这些期刊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责任编辑童根兴为出版本书所做的种种努力。

目 录

鸣谢 / 1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二章 作为社会行动范畴的“气”：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 / 24

第三章 中国当代抗争政治的结构背景：“气”的凝聚 / 58

第四章 依法抗争案例的过程叙事 / 79

第五章 “气”的初始释放与草根领袖的生成机制 / 95

第六章 “气”的加压与草根行动者的组织策略 / 110

第七章 依法抗争的行动策略：“气”的导引 / 148

第八章 群体性事件：从“气”到“气场” / 185

第九章 当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影响 / 202

第十章 结论与讨论 / 217

参考文献 / 228

第一章 导论

一种社会冲突在什么程度上服从利益追求的逻辑，又在什么程度上服从道德反应的逻辑，这永远是个经验问题。尽管如此，社会理论扎根在利益维度上，这就彻底遮蔽了我们对道德情感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以至于现在的冲突承认理论模式不仅有扩展的必要，而且有矫正的可能。

——〔德〕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

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投入诉讼之战虽然并不一定都是为了金钱利益，为了标的物本身，但他们也并不是（像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所说的）在为法治秩序下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斗争，而是在为礼治和德治秩序下具有差序性的位置而战斗，为一张脸和一口气而战斗。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序曲一

1994年，在经历了18年的曲折经历后，西南平县山阳镇的大河电站移民的集体上访终于告一段落。

然而，仅仅过了三年，1997年，平县山阳镇再起波澜。平县山阳镇是三峡工程农村移民的重镇。由于山阳镇农民对三峡移民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的不满，他们又开始了新一波的集体上访，持

续至今已达 13 年，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山阳镇的三峡移民的代表大多并非原来的大河电站移民的代表，而且这些三峡移民代表在这十多年间也屡有变迁。从 1997 年到 2001 年，山阳镇的主要代表是周克旺等四人。2001 年，周克旺等四人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县法院判刑。此后，山阳镇有九名上访代表被抓进监狱，数百位移民“钉子户”的房屋被扒。然而，山阳镇的移民上访浪潮始终没有停止，万人上书总是雪片式地飞往北京，千人呼号时常响彻政府门前。令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山阳移民的上访行动为什么竟会如此执拗？为什么那些移民代表出狱后并不吸取教训，反而走上了以上访为业的不归路？为什么他们会自愿走到抗争队伍的最前沿去？

序曲二

2008 年 6 月 21 日下午 6 时多，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部分群众和中小學生，因不满公安机关对一名女中学生死因的鉴定结论，不断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6 月 28 日下午，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 2 万多人，极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县公安局、县政府 100 多间办公室被烧，县委办公楼被烧毁，55 台机动车被烧毁或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大量公文和办公用具被毁，150 多人受伤。这就是震惊全国，甚至被认为注定要载入史册的瓮安“6·28 事件”（刘子富，2009）。

令我们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名女中学生的死因鉴定问题最后会迅速演化一起如此恶性和暴烈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成千上万与这名女中学生之死毫无关联的群众会纷纷涌入围观行列？如果他们的围观仅仅是好奇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又会在 6 月 28 日那天骤然卷入骚乱？在这些平日普通、安分、守法的群众突然卷入骚乱的过程中，除了极少数不法分子的煽动因素外，究竟还存在什么样的深层影响因素？

一 社会稳定问题的突出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势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这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社会稳定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 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社会出现断裂和失衡现象

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尽管触及某些既得利益群体,但从总体上说带来的是社会大多数人的普遍受惠。而19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别。我们可以从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指标——基尼系数近三十年来的重要变化上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1988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382;到1995年则高涨到了0.45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社会警戒线——0.4;而到2002年,基尼系数继续上升到0.47的水平(世界银行,2006;赵人伟,1994,1999;李实,2008)。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以及各种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有专家认为中国居民收入的实际基尼系数在2000年初可能就已经超过0.5(陈宗胜等,2001)。此外,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都越拉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在社会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人群的同时,城市里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农村里的农民成为两个人数庞大的弱势群体。在1990年代,城市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大量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2年,国有和集体企业共精简职工6000多万人(宋晓梧,2006)。而这个时期农民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收入增长缓慢,基层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税负却日益深重。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

费总额 1359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了 1.89 倍，农民人均负担增长了 2.01 倍，农民税费负担占农民收入的比重在 7% ~ 12%。实际上，有专家估算，2000 年农民承担的税费总额可能高达 1809 亿 ~ 2171 亿元（陈锡文，2005）。

进入 21 世纪后，在城市，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业形势有所好转，但劳动问题却日渐突出。据统计，1995 年全国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 3.8 万件，涉及争议人数 12.2 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 2588 件，涉及集体争议人数 7.7 万人；而 2004 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总数比 2003 年增长了 15.2%，已高达 26 万件，涉及争议人数 76.5 万人。其中，集体劳动争议案件比 2003 年增长了 72.7%，达到 1.9 万件，涉及集体争议人数为 47.8 万人。^① 而在农村，尽管 2006 年的取消农业税使农民的税负问题得到解决，但对农民生计影响更为根本的土地征用中的不公平问题却越来越突出。据专家估算，计划经济时代的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 6000 亿 ~ 8000 亿元的代价，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1990 年代后期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这种新的土地“剪刀差”，至少使农民蒙受了 2 万亿元的损失（陈锡文，2001）。

就此，孙立平（2003）提出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即断裂的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出现失控趋势，在资源积聚背景下开始形成两极社会，上层强势群体出现了寡头化趋势，而底层弱势群体则呈现碎片化趋势，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

（二）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

市场体制本身会带来收入的分化和贫富的差距，这本来不足为怪。但中国市场转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资源向少数群体的高度积聚与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密切相关。据不完全统计，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2005。

1990年代后半期，仅仅由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及公共支出性腐败这四类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高达13.3%~16.9%（胡鞍钢，2001）。

腐败的严重性使贫富分化的现状在相当程度上被赋予了道德不义性，底层民众的社会心态严重失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从1997年到2000年，群众都把腐败问题作为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汝信等，2001，2002）。据2006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最大的人最多（50.75%），但认为干部和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与冲突的人却最多，达28.3%。这与人们对致富的归因分析有关。该项调查显示，有71.4%的人认为近10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而在自认为是穷人的受访者对富人致富的归因中，选择“以不正当手段赚钱”的比例为51.2%，超过了选择“自身的努力拼搏”的比例（49.8%）（王俊秀，2006）。可见，在许多底层民众眼中，贫富差距与社会腐败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集中表现在对干部作风、腐败现象的不满，表现在对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的不信任上。

（三）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

更重要的是，民众对利益失衡和社会不公的不满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心态。利益失衡、分配不公、腐败盛行、失业恶化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这些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最后都汇聚成以“信访洪峰”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为表征的社会稳定问题。

据披露，全国集体上访数量自1992年到2004年连续13年持续上升。199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总量为479万件，2000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信访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人次）大关，达到1024万件（人次）。其中，集体上访量在2000年达到了24.58万批次、565万人次，分别是1995年的2.8倍和2.6倍。而中央信访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在2000年达到58.64万件，是1995年的1.46倍（周占顺，2001c）。2000年后全国信访总量

继续猛增，2001年、2002年、2004年全国信访总量同比上升8.7%、2.9%和13.4%。上访的层级结构呈现为“倒金字塔”形。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上访量上升14%，省级只上升0.1%，地级上升0.3%，县级反而下降了2.4%；其中，进京集体上访上升势头迅猛，该年国家信访局受理集体上访的批次和人次同比分别上升41%和44.8%，集体上访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农村中土地征用和法律诉讼等问题（张修成，2007）。据权威人士的分析，涉及群众政治、经济、生活等切身利益的案件（如农民负担、土地纠纷、职工下岗、房屋拆迁补偿）不仅一直是信访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近些年信访总量和集体上访量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周占顺，2001b）。

更令人瞩目的是，群体性事件作为表征社会尖锐矛盾的敏感信号，近十多年来表现出了数量扩大、规模增加、行为激烈、诱发点多、涉及面广、对抗性强等特点。全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4年的7.4万起，年平均增长17%；参与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76万多人，人数年均增长12%；其中，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多起。20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一度下降，但从2006年起又上升到6万多起，到2007年达到了8万多起，而在2008年间更爆发了一些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李培林等，2008；王东进，2004）。

有些学者将社会冲突分成三种形式：圆桌政治，即包括信访、人民调解案件、劳动争议案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在内的合法解决利益冲突的渠道；夜晚政治，即包括治安案件、刑事犯罪案件和腐败犯罪案件等在内的违法犯罪活动；聚众政治，即以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介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抗争行动。这些学者按照这种分类，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其结论是：从1994年到2004年，一方面，圆桌政治、夜晚政治和聚众政治的案件总数都在不断上升，但社会冲突总量中的相应比例发生了重要变化。圆桌政治案件在社会冲突总量中的比例从79.19%下降到70.62%，而夜晚政治的比例却从20.77%上升到了29.19%，聚众

政治的比例则从 0.04% 猛升到了 0.19%。这反映出社会冲突不但在数量上增多,而且在程度上加剧。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指数,圆桌政治指数、夜晚政治指数和聚众政治指数分别从 1994 年的 100 上升到了 2004 年的 469.5、455.4 和 443.6,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6.7%、16.4% 和 16.1%,社会不稳定因素总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在 14.0% ~ 16.7%,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 8.7% (胡联合、胡鞍钢等,2009: 26 ~ 66)。这意味着自 1994 年以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快速恶化,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并不是一个概念。中国目前社会矛盾虽然非常突出,但政治仍保持基本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因素(孙立平,2004):其一,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的迅速增强使政府具有较强的解决突发事件的资源 and 能力;其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其三,1990 年代中期以来,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以及文化精英在相当程度上结成了联盟关系,这个掌控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精英联盟影响着政府决策和公共舆论,具有社会定型的强大力量;其四,市场体制具有使社会矛盾分散化的效应,各个社会群体在利益追求上具有较大差异,各种社会矛盾并不容易同时叠加在社会的基本安全线上发力,从而造成社会的崩溃。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较大的弹性,中国近期发生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我们不应对当前的社会稳定形势做过分严重的估计,尤其是不应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直接等同于政治不稳定来加以严防死守。我们的研究表明,僵硬的、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常常会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越是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维稳”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会越多,“维稳”成了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立平、晋军、应星等,2010)。

当然,社会稳定问题处理不好,也可能转化为政治稳定问题。无论是社会稳定问题本身,还是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的政治稳定问

题，都引起了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家在改革的战略与治理的技术上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2003 年，国家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2004 年，国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并开始大规模地治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8 月，中央召开了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1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并召开了全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电视电话会议。2005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信访条例》，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开门大接访活动。2006 年 10 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专题分析与部署。同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妥善处理群体性行政案件的通知》。2007 年 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同年，第六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开。2008 年 7 月，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颁布实施了《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2008 年 11 月，全国 2000 余名县委书记在五所国家级干部培训学校轮训，学习的重点内容是维持社会稳定及突发事件处理。2009 年 2 月到 6 月，全国 3000 名县公安局长和 2000 名县纪委书记进京轮训。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先后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四个文件。2011 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社会管理创新被列为研讨班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与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

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这一系列举措表明，社会稳定问题原来在1980年代的国家治理中还属于一个边缘性的问题，而今已经上升为一个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

我曾经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对1980年代中国乡村的群体抗争及其治理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应星，2001）。而本书接续该书的问题研究线索，在今天社会稳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全局性问题和国家治理的中心性问题的情况下，去思考中国乡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级政府相应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怎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二 既有的研究

西方学术界关于革命、社会运动、集体行动或抗争政治的文献众多，其基本概念也纷繁复杂。本书采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这个概念来统摄相关的概念。

本书为什么不用“革命”呢？这是因为“革命”这个概念的指涉非常明确，指的是高度组织化的、大规模人群参与的、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并改变政权性质的政治行动。这种行动不曾见于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①那为什么不用“社会运动”呢？这是因为“社会运动”这个概念一般强调的是西方民主政体下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它不大适合中国社会的情况。我曾经用“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作为一个统摄概念（应星，2007c），这是基于这个概念的指涉较广，可以适用不同政体下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的社会抗争方式。不过，这个概念使用起

① 中国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因为这场所谓的“革命”是由最高领袖号召和指挥的政治行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来也有一些缺陷。它有时被混同于西方早期相关理论中的“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ur）。比如，赵鼎新在他国内较有影响的一本教材——《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中就是这样定义的：“集体行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为。”（赵鼎新，2006：2）而有时这个概念又容易被引向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1995）对其所赋予的那种理性色彩过于浓厚、指涉过于广泛的含义。

相比之下，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三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抗争政治”是一个既有较强的理论包含性，又具有较高的理论明晰性的概念。这三位学者对“抗争政治”所下的定义是：“诉求者和他们的诉求对象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者被要求的对象，或是站在诉求者一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诉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7~8）^① 在这个定义中，“偶尔的”一词的限定，将其与定期的、常规的政治活动（如投票）区分开来；“公共的”一词的限定，将其与教会或公司等特定组织的活动区分开来；“集体的”一词的限定，将群体性的抗争与个体性的抗争区分开来。而其定义中所说的对诉求者利益的影响，界定了诉求者与被诉求者之间属于冲突性的而非合作性的行动。当然，“抗争政治”又内含两个亚范畴——“有节制的抗争”和“逾越界限的抗争”，这实际上整合了制度化的抗争与非制度化的抗争、社会运动与革命这些以往更被强调差异性的概念。尽管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目前尚缺乏中国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特别是政治社会学体系的情况下，我认为可以在统摄概念的层面接受“抗争政治”这个概念。不过，我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具有某种

① 该书有中译本（麦克亚当等：《斗争的动力》，李义中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但翻译中至少有两处错误：一是把 Contentious Politics 误译成“斗争政治”；二是在作者对 Contentious Politics 的定义中把 public（公共的）误译成“公众的”。

权宜性。本书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的挖掘和提炼,虽然尚不足以完全颠覆“抗争政治”这个概念,但至少已经构成了某种张力。

西方关于抗争政治的研究脉络简略地说有三条。

其一是阶级论的脉络。这是解释抗争政治最经典的理论脉络。它强调抗争政治不是偶然出现的暴力事件或社会冲突,而是以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饱受冲突折磨的社会结构矛盾中。爆发革命的渊源即在于社会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断裂。马克思(1972, 2001)首先开创了这一分析传统,后继者包括葛兰西(1983)、霍布斯鲍姆(1999)、波兰尼(2007)、汤普森(2001)等人。此外,摩尔(1995)、斯考切波(2007)和沃尔夫(Wolf, 1969)等人对农民革命的结构分析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但阶级论的逻辑是否适合分析现代西方社会,在西方主流学界还长期存在争议。

其二是情感论的脉络。在西方20世纪前半期的抗争政治理论中,情感论曾是主要范式,它主要是从人的情感或心理来理解抗争政治的起源。它或者强调诸如相对剥夺感、心理预期值的错位等心理挫折所带来的攻击性行为,或者强调群众现象的形成所影响的集体无理性行为,其代表人物有布林顿(Brinton, 1932)、格尔(Gurr, 1970)、勒庞(2007)、布鲁默(Blumer, 1946)、斯梅尔塞(Smelser, 1962)等。但自196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兴起后,情感论因其看待社会运动整个过程的非理性和病态性而几乎被完全抛弃。近年来,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开始重新把情感视角带回来。^①不过,与早年的情感理论不同的是,当代西方

① 一般而言,北美学者所主导的社会运动理论与欧洲学者所主导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在社会运动研究的对象、方法上存在相当差异:前者更重视用实证方法研究传统社会运动的机制,后者更重视研究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反战运动等基于非物质需求的新社会运动,更重视研究社会运动的文化意涵和认同政治(参见克里西等[2006],图海纳[2008])。不过,在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情感转向中,这两条线索又有某种融汇的趋势。因此,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把西欧新社会运动的研究大体放在当代情感论的脉络中来观照。